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東亞「將軍號」之研究：中、日、韓之比較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2-2411-H-002-048-

執行期間：92年08月01日至93年09月30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甘懷真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2 月 31 日

一、 中文摘要

本計畫是藉由東亞諸國（主要指中、日、韓）共通的將軍號制度，探索歷史上的「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尤其集中於「冊封」體制。而我希望藉由冊封體制的解明，理解前近代（尤其是古代）的東亞的獨特的國家型態及其國際秩序。

中國與週邊國家的冊封關係可上推至西漢。第三世紀以後，中國週邊國家進入一波的建國運動，尤其是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而各國在建國中，紛紛尋求中國的冊封。當時的冊封，是指被授與中國官爵，包括在地爵位（如王）與將軍號。本研究即專注探討將軍號與冊封體制的問題。經過一年多的研究，有以下結論與成果。

一、將軍號的使用，證明第三世紀以後，漢代所創造的政治原理及其符號成為東亞地區共通的制度。新興王權要在建國運動中取得自我認同，以確定人我間的位置與關係，必須使用中國的制度。故將軍號代表了一種「普世」的秩序。

二、東亞古代的新興國家要取得對內的合法性，必須取得外部的承認。但不同於今天的國際承認，當時的外部承認是中國的冊封。

三、藉由考古證據探索禮物交換所建構的政治秩序。本次計畫也得國科會獎助，故得以至日本參觀相關考古遺址。

四、將軍號所反映的戰爭體制，而本計畫探索這種戰爭體制如何成為中國與週邊國家結合的機制。

五、計畫執行期間，參加六次研討會並宣讀論文。

六、韓國方面的史料由於韓文閱讀的問題，仍有待克服。

關鍵字：

東亞世界 冊封體制 將軍號 王權 儒教 韓國 日本 中國 漢字
文化圈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的目的在重新探索歷史上「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而藉由既有的東亞史學說中的「冊封」理論為依據，且以「將軍號」為考察對象，探究中國、日本、韓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所建構的東亞政治秩序。

自 2000 年至 2004 年，我執行教育部資助之「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中之子計畫「德川時代關於中國禮學的詮釋」，也因此近年來專注東亞政治史的探索。該計畫的一項目是探究東亞諸國如何運用東亞的共通文化資源以建構現代國家。2002 年起，我在教育部支持的大型研究計畫「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執行「東亞歷史變遷中的權力與經典詮釋」研究計畫，將此課題嘗試作多層面的探討。此次接受國科會支持的本計畫，也是在此研究的興趣與方向上，探討歷史上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

筆者的東亞史研究的興趣在於探索東亞的國家的型態。近代以來的國家(nation 與 nation-state)是源於近代西歐，是一種特殊的政治型態。持此政治型態衡量傳統中國與週邊東亞國家，自不是一種「國家」。故有學者稱前近代中國為帝國一類。但我在研究方法上，預設「多元國家」，即前近代的國家型態具有多元性，歷史上的東亞有其獨特的國家型態。而我從既有的東亞政治系統理論的為基礎，再次根據「冊封」原理探究歷史上（尤其是古代）東亞（中、日、韓）的國際關係與國家型態。

第三世紀之後，日本列島與朝鮮半島都進入了新的建國階段。第四世紀之後，朝鮮半島上的諸國向中國朝貢與接受冊封；第五世紀之後，日本列島上的大和政權也向中國朝貢並接受冊封。所謂冊封所接受的中國式官職有兩類，一是在地王爵，如高麗王一類；二是將軍號，如安東大將軍一類。歷來研究冊封體制較少專論將軍號，故我以此研究計畫所所提供之資源為憑藉，在這一年兩個月期間，專注東亞（中國、日本與韓國）的將軍號相關課題的研究。

有關中國的將軍號起源與發展，目前已有了清楚的輪廓，主要的研究者有嚴耕望、大庭脩、勞榦、安作璋、窪添慶文、王德權與岡部毅史等。其概要及意義如下。將軍號原來作為一種臨時性的軍隊統領職務，自春秋戰國以來即有。最初可能沒有一定的稱號，西漢時逐漸形成「四將軍」，即大將軍、驃騎、車騎、前、後等名號不同而較固定的軍號。這種源於軍事與軍功性質的官銜，在西漢以後成為正式的官職。漢代的正規軍分作二類，一是中央軍，二是郡國兵。另外尚有將軍制度，將軍「掌征伐」用六朝的術語，即「征官」。將軍制度用隋唐的用語，即「行軍制度」。將軍是屬於中朝官，依據漢朝的法制，將軍是「不常置」，當有戰事發生時，朝廷才命將出征，授與主帥將軍的官銜，將軍由中央率軍出征。戰爭結束後，將軍解職歸朝，回復出征前的官職。故將軍不常置。武帝、昭帝以

後，將軍逐漸成為常設的官職，這也配合前述漢代中朝官的發展。將軍成為中央軍的領兵官，將軍之號亦為中央軍的軍號。官員一旦被命為將軍，則可以開府，即幕府或幕府。將軍開府可以有以三項特權：一是領兵，即朝廷配兵，所配之兵以中央軍為主。二是當方面之任。由幕府一稱可知，這是一種行軍體制，在征戰過程中，由於軍隊的行進無常，故以指揮部以帳幕為之。幕府將軍在外作戰期間，是代表中朝，可以指揮軍區內的郡國兵與戰。幕府也可以看成是臨時性的中央政府。三，開府將軍的特權之一是辟召僚佐。故將軍號雖作為皇帝制度的「官僚制」與「郡縣制」下的官職，但有若干「封建」的性質，即有將軍號者可以開府，故有方面的軍事獨裁權，及由此衍生的人事權。漢末，由於漢政權的危機，漢朝濫授將軍號。中國中古時期所發生的軍閥現象與地方政權的坐大，就制度面而言，是此類將軍開府制度所造成的。如筆者曾研究中古辟召制度形成府主、僚佐之間的君臣關係，而且構成一種制度性的人際關係，且由此建構了中古時期的政治集團。（甘懷真,1997、2002）

將此課題擴展到「東亞世界」。如眾所周知，在歷史上，中國與域外政權的關係主要是透過冊封。中國政權授與外邦君主一王銜，如「漢委奴國王」。而自魏晉以來，如高明士之學說，中國政權冊封外族酋長是使用內地的官制，即授與外族酋長中國的官銜，此種官銜是由內地官職、虛封爵制與本國王爵所構成。這種冊封體制為「內臣化」，即一方面承認外族酋長的統治權，另一方面則將他們納入國內的政治秩序中，視為國內官員。如隋朝冊封這一年來朝貢的百濟酋長「王濟王」，此銜為中國所承認的外族酋長的本國王爵，此外再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等中國內地的官銜。而對高麗酋長則冊封「高麗王」，並帶有「大將軍、遼東郡公」等內地官銜。由此可見將軍號為中國皇帝授與外邦君主的官銜之一。

根據目前已知的若干史料，得自於中國的將軍號不只是作為諸國與中國往來的憑藉，或中國方面如何定位外邦君主的等第，也是外邦君主自身定義自己的名號，並藉此自我認同於以中國為中心的政治世界。故本次計畫的主要工作是調查日本與韓國自第三、四世紀的建國運動中，得自於中國的將軍號如何與其自身及國際間的政治秩序運作結合。

三、討論與結果

在計畫執行期間，研究工作主要分作三部分，一是整理與分析諸史料中與將軍號相關的史料，包括開府體制、都督府制度。二、蒐集日本史的史料中與將軍、都督有關的文獻。三、參訪日本、韓國相關的史跡與學者。四、參與研討會，發表初步的心得報告。

第一、二部分的成果不在此列舉，將表現在目前正在撰寫的幾篇論文中。至於第三的赴日、韓參訪如下。我於 2004 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接受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與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的資助，赴韓國漢城與安東參訪學術機構與考察古蹟。2004 年 8 月 5 日至 14 日，由本次研究計畫的出國考察經費支付，前往日本東京及其附近、京都、大阪參訪學術機構與考察古蹟。

至於第四的發表論文部分，在計畫執行間，我積極參與各種學術研討會，發表與東亞冊封體制相關的論文，直接與本計畫研究相關者如下：

- 東亞世界的冊封體制與儒教，宣讀於「東亞世界與儒教」國際學術研討會，大阪，關西大學，2004 年 9 月。
- 「天下」觀念的再檢討，宣讀於「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2004 年 8 月。
- 從日本律令制看王權與儒教：「天下」觀念與律令的成立，宣讀於「東亞教育與法制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臺北，臺灣大學，2004 年 5 月。
- 日本古代的儒學與王權：以「天下」觀念為例，宣讀於「東亞儒學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桃園，中央大學，2004 年 5 月。
- 東亞、儒學與王權：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研究的一面向，中央研究院「上古中國的形成、內涵與邊境」第四次讀書月會中報告。2004 年 4 月。
- 東亞作為方法：一種史學方法的探索，宣讀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史學和比較歷史思想」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2004 年 4 月。

就具體的研究成果而言，有以下的初步結論，未來將展開於論文中。

- 一、 第二世紀後，漢朝的國勢衰弱，對於邊境州郡的控制也減弱，也連帶的使原本受節制於中國邊境政府（如樂浪、帶方郡）的域外政權（如韓與倭）展開了另一階段的建國歷程。在這個歷程中，雖然一方面中國的政治力衰退，但另一方面漢代中國所建構的政治知識與

制度，卻成為東亞世界的共通文化。曆法（正朔）是其一；政治制度的符號與概念是另一，如將軍號。故我們從當時的歷史脈絡言之，將軍號並不是中國的官職，而是一種普世性共通的官銜。雖然這樣的比喻不完全正確，但可聯想今天軍職中的五星上將、四星上將等將軍銜，我們會認為這種將軍銜是一種軍人階級制度，具普遍性，而不認為是美國的、英國的。只不過在初期，合法的將軍號的授與必須出自中國天子，由此可見中國獨擅授與將軍號的授與。

二、由多數冊封的例子可知，冊封關係締構的主動者多在於中國的域外政權。而中國週邊國家（尤其是東邊的農業國家）主動來向中國朝貢並接受冊封，是要使其新建的國家得到承認而具有合法性，而當時的方法並不是如現代國家的主權架構去要求國際承認，古代東亞是要求中國皇帝冊封。第四世紀的諸韓與五世紀的倭國，都是在驚濤駭浪中新成立，其統治者尋求政權合法性的方法與策略是尋求中國的承認，即得到冊封。而且與近代以來主權國家不同，古代東亞國家在建國過程中，並不是尋求各國承認其「主權獨立」，而是尋求被納入以中國天子為頂點的政治體系，而其方法是得到中國天子的冊封。

三、冊封體制不只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作為今天所謂的「外交」，而是東亞一種政治體制，包含國內的政體。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當時日本與韓國的國內，也是重層的冊封體系，即國王（如倭王）作為倭人之「王中之王」，會與國內諸王交換禮物；而「王」又與其下的豪族政權的領袖交換禮物。從目前許多考慮證據顯示，當時日本的王中之王（如奴國、伊都國、邪馬臺國與大和政權）受中國冊封，從中國處得到禮物（青銅禮器一類），而這些禮物作為王權的標幟而下賜給所屬諸政治團體（諸王）。本研究計畫的執行，蒐集了許多此類相關的考古證據。二，日、韓等國從中國處得到中國式的官銜，包括國王與其所屬官員。這些官銜不只是作為外交之用，可作為日、韓官員的自我認同與定位。如現存於韓國的「百濟武寧王誌石」（約西元 523 年）中，記載武寧王之喪，其中對於武寧王的稱號是：「寧東大將軍百濟斯麻王」。寧東大將軍之號是在

523年獲授於中國南朝的梁武帝。由百濟方面自製的碑文內容可知，中國式的將軍號不只是作為中國朝廷對於百濟王的認同與定位，也是百濟王自身對其政治身分的認同與定位。且不只是百濟的王權的名分須藉由中國式的政治概念而得到肯定，百濟國內的其他高級官員的政治身分也須要中國式官職而來的名分。如百濟蓋鹵王受中國南朝劉宋政權冊封之後，第二年（458），百濟王餘慶更請求中國朝廷（宋）授與百濟之高級官員餘紀等十一人中國式的將軍號。就此推論，在第四世紀之後，中國式的官職的意義不僅是來自中國的頭銜，也是東亞世界中的普遍名分，故用以自我認同。

四、東亞歷史上，諸國的結合型態，可分為戰爭與祭祀。故王者可分為「戰爭王」與「祭祀王」。將軍號體制是一種戰爭體制，即東亞諸國的結合是透過戰爭（軍事）的機制而結合。在這年度的研究中，如何從戰爭體制與祭祀圈，探索東亞各國的王權與建國歷程的各種政治體制。

五、 成果評量

本年度的研究計畫，大體上按照計畫書的規畫進行，並已將初步的成果，藉由學術會議場合宣讀論文，如上述。計畫書中所擬研究的東亞古代部分，已整理相當完整的資料，與初步的結論，亦如上述。而這些成果將可收入筆者在撰寫中的《東亞王權論》一書中。但計畫書中所擬研究的近世日本的天皇制、幕藩制與武家社會的相關課題，尤其是日本如何理解將軍制度，並比較中國的軍府制度及中國對於「二重君主觀」的批判，則限於時間，在這次的研究中，並未有充分的關注。

由於受國科會的獎助，得以赴日本考察，參觀許多考古遺址及蒐集相關考古文物的資料，則收穫甚大。

然而，由於中、日、韓研究涉及諸種不同類型的史料，故在資料蒐集上，仍有加強之處。尤其是韓國史料，由於我不能讀韓文，故仍有諸多待補充之處。